

读海昏侯墓“孔子传记”小札

郑伊凡

(美国 伯克利 94706)

摘要:出土于海昏侯墓西椁室的孔子衣镜铭文中有一篇共 13 行的文本,被称为“孔子传记”,其内容与《史记·孔子世家》及《太史公自序》相关内容大部分相近同。本文根据整理者公布的释文,重点探讨了传记第六行中以“上毋天子”起首的一段疑难释文,提出“臣詒君子口必”一句可能应据《越绝书》《公羊传》等传世文献读为“臣弑君,子弑父”。受目前公布的图版清晰度所限,相关字形判定存在难度,结合其他出土材料来看,至少“必”与“父”因字形相近而讹混或误释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孔子传记;文字释读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1)05-0081-06

2015年7月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以其墓葬等级与规格、随葬品的丰富和价值、发掘过程的科学性与轰动效果,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关注与反响^[1]。陪葬漆箱的5200余枚竹简和170多版本木牍尤为引人瞩目^[2]。据近期出版的《海昏简牍初论》介绍,这批简牍的红外扫描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两家合作研究单位根据红外照片对部分简牍作了初步的编连与释读^[3]。相信这批材料全部正式公布后,一定会再次引起考古、古文字和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笔者研读了整理者先后两次公布的出土于墓葬西椁室的孔子衣镜铭文中的“孔子传记”^[4],并比较了“传记”和《史记·孔子世家》等其他关联文本,对个别释文及文本内容有一些学习体会,草撰小文以就教于学界专家。

汉隶体,分栏纵向排列^[5]。从整理者公布的图像来看,记录“孔子传记”的镜框木板已断裂为三块^[6],断裂处有残损缺文,左侧及上部有多处文字漫漶难识。尽管存在种种客观困难,整理者仍然作出了非常精审的释文,让我们得以尽早了解相关文字内容,也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对照《海昏侯简牍初探》中公布的镜框图片及分栏书写的释文可知,“孔子传记”全文共分13栏,自右上方起首,总字数约480余字^[7],其中不确定的释文约有9处,整理者以“(?)”标示于相应释文之后,另有约八个字无法识别,用“□”表示。对比《初探》与整理者2016年公布的释文可以发现,二者大体一致,《初探》对2016版释文略有改动。比较显著的有,(自右边数)第七行中部的“紀十二公事”改释为“列十二公事”,第八行上端的“亡國十二”改作“亡國𠄎(五十)二”,第十行的“編次其事”释作“綸次其事”,以及第十二行的“歿”改释作“殁”。如整理者已经指出的,“传记”的主体内容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自序》及论语中的个别篇章可作对读,部分内容略有出入^[8]。

“孔子传记”书写于孔子衣镜的镜框背板,据整理者在2016年的文章披露,镜框背面中部为孔子及其五个弟子的图像,图像两侧为墨书记载人物生平及言行的传记。文字为

作者:郑伊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博士候选人。

笔者曾做具体统计如下：“传记”中有大约290字和《孔子世家》内容相同，另有约五十余字与《太史公自序》相同，文本内容一致之处只在个别语句结构和字形（如异体字）上略有差异^[9]。

在“孔子传记”和《史记》相关篇章共享约70%文字信息的情况下，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自然就格外引起学者注意。如整理者在2016年的释文本中即已讨论了“野居”（“传记”）与“野合”（《史记》）之别，“鲁昭公六年”（“传记”）与“鲁昭公二十年”（《史记》）之差，以及孔子弟子“七十七”（“传记”）与“七十二”（《史记》）之异，并提出了系列见解^[10]。本文主要就第六行的文字释读提出个人看法，拟借助其他相关传世文献的内容对几处释文提出一些蠡测，以期为此批文本的进一步释读和研究提供若干新的可能参考。首先把第六行的文字释读逐录如下：

盛德衰上毋天子下毋方伯臣詒君子□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弟縷耳孔子

这段文字在《史记》中没有可直接参照的内容，但在不少其他文本中可以找到其“平行文本”，其中最相似的一段记载见于《越绝书·吴内传》：

当此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诸侯力政，疆者为君。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如线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据鲁以王。故诸侯死皆称卒，不称薨，避鲁之谥也^[12]。

比较两段文字，不难发现其主要差别在于文字基本单元的排列顺序问题。如果把“孔子传记”中的这段内容进一步拆分为几个次级文本单元，首先最容易找出来的当然是“上毋天子下毋方伯”，“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弟縷耳”两个单元。接下来把传世文献中的其他平行文本分别与之搭配（表一）。

对比表一左右两侧的文本可以发现，“孔子传记”中的“強者為右”一句在传世文献中也能找到对应的文本，即《越绝书》中的“疆者

為君”和《淮南子》中的“胜者为右”。接着讨论“孔子传记”中夹在两个文本单元之间，尚未完全读通的这段文字：“臣詒君子□必四面起矣”。容易发现在第一个表格中的《公羊传》和《说苑》中分别有“臣弑君，子弑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文字，与“孔子传记”相对照，自然引人想起文字释读存在讹误的可能性。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整理者释读为“必”的字是否有可能释为“父”。这样一来，该句中既有了“臣一君”，“子一父”的两组对应关系，同时前后文的句子结构也更加清晰。若按整理者原释文，虽然中间缺释一字，但从语句来看“必”字恐怕要从下连读作“必四面起矣”，语意指向不甚清晰，语气也略显怪异。且这样一来该句只剩下“臣詒君子□”，若缺文处仅能容一字，无论补上什么字都很难读通全句。笔者认为“必”字是“父”字误释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

如前所述，目前公布的镜框图像漫漶难识，其中第六行文字仅自“北夷”以下尚能隐约看出文字笔画，中上部存在断裂且表面乌漆难辨。借助与海昏侯简牍年代相近的其他汉代简帛资料，考察其中的“必”与“父”字的字形与写法（表二），在“必”“父”二字上部书写连笔的情况下，无论是与海昏侯简牍年代相近的居延简，还是同被归为隶书体的西汉马王堆帛书中，二字字形都比较接近，在文字残缺和表面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极易讹混。若此推测勉强可以成立，则“必”应改释为“父”且从上连读，该句余下的部分“四面起矣”在语意上应当与下文的“強者為右”连属。前文已提及，“強者為右”在《越绝书》与《淮南子》中的对应文本分别是“疆者为君”和“胜者为右”（表三）：

以上讨论可知，“必”改释为“父”在文例和字形上都能找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至于该句中未能释出的字，可能因为受镜框断裂的影响难以修复，突破口可能是“臣詒君”一句

表一

“孔子传记”与相关传世文本内容对照表之一

上毋天子下毋方伯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有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13]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一年》))
臣詒君子口必	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 ^[14] 。((《说苑·修文》)) 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15] 。((《淮南子·要略》))
四面起矣強者為右	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诸侯力政,疆者为君。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如线矣。臣弑君,子弑父((《越绝书·吴内传》))
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弟縷耳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16] 。((《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线 ^[17] 。((《汉书·韦贤传》)) 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淮南子·要略》))

中间的字形。就笔者阅读这段话的体会,第六行中的其他文字或许也存在改释的可能^[23],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等到更清晰的图版照片公布。

最后,本文还想顺带提及“孔子传记”和《史记》的关系。就内容的一致性和重合度而言,“孔子传记”和《史记·孔子世家》这两个文本之间共享的文字内容比其他任何文本都要多。甚至过去认为一定是出自司马迁本人的文本内容(如赞、序等),也见于“孔子传记”。吕思勉先生在讨论《史记》的创作时,指出太史公当时依据了大量材料,还说到“《史记》的文字极大部分,并非太史公所自作的”^[24]。那么“孔子传记”和《史记》的相似性是否因为二者建立在共同的文本基础之上呢?吕思勉先生还补充说:“就其大体而言,则《序》和《论赞》必有一大部分是他自己做的,因为这是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而“孔子传记”的最后一段内容也几乎完全因袭了《史记》中本属于“太史公曰”的内容^[25],只是不包含“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一段完全体现司马迁“个人化”的表达。这种内容上的因袭和“回避”让人感觉“孔子传记”的作者可能是在《史记》内容的基础上“二次创作”的这篇压缩版传记文字。不过这种猜想立即要面对的问题是《史记》在西汉的流传问题,海昏侯墓的埋葬年代应当是在刘贺死去的当年,即公元前59年,“孔子传记”作为陪葬品的制作年代至少早于此年,孔子衣镜铭文的制作作者是否有可能参考过某个版本的《史记》,学界就此问题已有一些初步的探

表二

相关字形图对照表

必			
	居延 59.13 ^[26]		马王堆《刑德乙》039 ^[27]
父			
	居延 45.1A ^[28]	居延 10.37 ^[29]	马王堆《春秋事语》 ^[22]

表三 “孔子传记”与相关传世文本内容对照表之二

孔子传记	上毋天子,下毋方伯	臣詒君,子口父	四面起矣,強者為右
《越绝书》	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	臣弑君,子弑父	诸侯力政,疆者为君。
《淮南子》	下无方伯,上无天子		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索^[26]。期待整理者在进一步的清理、修复和校释工作完成后,为学界呈现更多可供研究和探讨的资料。

注释:

[1]有关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及墓葬相关信息,请参看杨军、徐长青等执笔,署名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的文章:《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第45-62页;有关随葬品信息可参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主编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2]关于海昏侯墓出土的随葬简牍资料的介绍,参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文物》2018年第11期,第87-96页。

[3]参阅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中华书局,2020年。正文中或简称为《初论》,皆指此书,不另出注。

[4]为方便指称,本文暂且称之为“孔子传记”,不再出注。在《海昏简牍初论》出版之前,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管理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一文中已公布镜框正反面的图片和文字释文,文章发表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1~70页。本文对衣镜铭文的了解和阅读始于此文,文中释文则多依据后来出版的《海昏简牍初论》。孔子衣镜早先也曾被叫做“屏风”,这批材料在海外也引起关注,相关研究可参看Guo Jue, “The Life and Afterlife of a Western Han ‘Covered Mirror’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of Haihun (59 BC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2019), 1-30.

[5] 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第64页。

[6] 镜框背版图片可参看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367页。

[7]释文分别参看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第64页;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368页。其中有几处合文、重文,统计时按两字计算,具体数字容有出入。

[8] 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第66页。

[9]此处的字数指同时出现在相互比对的两个文本中的文字,部分文句可能在其中一个文本中内容更丰富,导致相同的文字部分或有个别字词的隔断,这种情况仍统计在内。

[10]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第66~67页。

[11]“弟”字在王意乐等2016文章中初释为“如”,《海昏简牍初论》中改释为“弟”,或取“但”“只”之意。此处原始引文维持繁体,下文所引其他文献则径转换为简体,特此说明。

[12]李步嘉撰:《越绝书校释》卷三《吴内传第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3页。此处引文最初是在课堂讨论时由加大伯克利历史系博士生Trenton Wilson提示,特此志谢。

[13]阮元校刻“清人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春秋公羊注疏》卷十六,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202页下。

[14]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十九《修文》,中华书局,1987年,第499页。

[15]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二十一《要略》,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0~1461页。

[16]阮元校刻“清人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春秋

公羊注疏》卷十,第126页下。

[17]班固撰《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四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6页。

[18]字形图片截取自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壹),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9,2014年,第190页。出土地为A8破城子。

[19]相关字形取自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壹),中华书局,2014年,第225页。

[20]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壹),第146页。出土地为A8破城子。

[21]同上,第38页。出土地为A33地湾。

[22]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柒),第37页。

[23]比如,笔者还曾推测“四面起矣”的“矣”字可能是“兵”字之误。因汉简中二字形体接近,且释为“兵”在文意和语气方面都更符合上下文语境,甚至释为“訖”的字也可以考虑是“殺”(读为“弑”)的可能性,不过“訖”字在出土简帛中较为少见,目前仅见于里耶秦简8-461的更名方,二字右半部分“它”与“殳”形体较为接近,左半部分差异较大。这些推测纯属“理校”,同时也受到传世文献的过度影响,未必站得住脚。姑存于此,有待于更清晰的图版公布后才能作进一步判断。

[24]吕思勉:《吕思勉集》,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25]录其原文如下: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至今不絕。學者宗之,自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对照《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的内容,仅有两处不同。一是《史记》没有“至今不绝”四字,二是海昏侯镜铭中没有“天子”而只有“王侯”。笔者以为,这两处差异都是比较能体现文本“个人化”特征的。

[26]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9卷第5期(2016年),第16~23页。王刚:《孔子评价与文本生成——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之比较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4页。

Notes on “Biography of Kongzi” from the Tomb of Haihun Marquis

ZHENG Yifan (Berkley 94706, USA)

Abstract: There is a thirteen-line text that summarizes Kongzi’s life, inscribed to the left of the image of Kongzi on the mirror stand cover, unearthed from the west chamber of the tomb of Haihun Marquis. This text is parallel to several sections of *Shiji*, especially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Kongzi,’ and could therefore be seen as an early version of the ‘Biography of Kongzi.’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sixth line in the current transcription beginning with ‘Shang wu tian zi’.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urrent transcription should be corrected as “chen shi jun, zi shi fu”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to other transmitted documents such as *Yuejueshu* and the *Gongyang Tradition*.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recognize and identify the corrected characters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of the image of the mirror stand, it is well-founded to determine that “bi” was mixed with “fu” based on their similar character forms found in other excavated manuscripts.

Keywords: Tomb of the Haihun Marquis, mirror stand of Kongzi, Biography of Kongzi, transcription of the text

(责任编辑、校对:凡国栋)